

被围观的十字架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当代大众文学

陈奇佳 宋 晖◎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陈奇佳 宋 晖◎著

被围观的十字架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当代大众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围观的十字架：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当代大众文学/陈奇佳、
宋晖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9
ISBN 978-7-5004-8793-7

I. ①被… II. ①陈…②宋… III. ①基督教—影响—当代
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90575 号

责任编辑 史慕鸿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31.75 插 页 2

字 数 533 千字

定 价 54.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05CZJ003)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中的基督教影响”的结项成果

目 录

导言	(1)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1)
第二节 研究的范围与对象	(8)
第三节 研究的方法	(10)
第一章 遇到异乡的神祇: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基督教文化影响	(19)
第一节 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	(19)
第二节 神坛外部的写作	(22)
第三节 神圣元素的融合	(29)
第四节 余论	(38)
第二章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基督教影响	(39)
第一节 意识形态的打量	(41)
第二节 文化诗学构筑向度中的基督教文化	(50)
第三节 信者之路	(60)
第四节 余论	(71)
第三章 大众文学力量的重新崛起	(73)
第一节 中国大众文学力量的重新崛起	(73)
第二节 十字架的阴影与黄易的创作	(79)
第三节 基督教文化的踪迹	(88)
第四节 从上帝到超越性存在	(95)

第五节 重构中的东方玄学·····	(104)
第四章 大众的耶稣:商业化文学生产中的基督教形象 ·····	(113)
第一节 概述·····	(113)
第二节 探询基督的奥秘·····	(126)
第三节 教会体制批判·····	(131)
第四节 追忆曾经相遇的片刻·····	(140)
第五章 寻找上帝之外的上帝:商业化文学生产中的超越性问题 ···	(156)
第一节 超越的问题·····	(156)
第二节 力的原则·····	(164)
第三节 人的原则·····	(171)
第四节 进化论崇拜·····	(178)
第五节 暗黑本体论·····	(183)
第六节 生命的权柄·····	(190)
第七节 灵魂、信仰、爱·····	(200)
第八节 其他的超越能指:艺术、外星人、异能 ·····	(211)
第九节 余论·····	(218)
第六章 大众文学与本土的超越向度 ·····	(223)
第一节 中国超越思想的基石·····	(223)
第二节 道教的重新发现·····	(240)
第三节 巫与神话·····	(266)
第四节 儒家、佛教、诸子百家及其他·····	(281)
第五节 余论·····	(296)
第七章 大众中的小众:基督教文化与非纯粹商业性的大众 文学生产·····	(299)
第一节 大众的分层·····	(299)
第二节 网络逍遥派·····	(306)
第三节 教会文学·····	(325)
第四节 纯情文学·····	(334)

第五节 耽美文学·····	(339)
第八章 选择与疏离:大众文学中基督教批判的立场研究 ·····	(347)
第一节 精英与大众之异同·····	(347)
第二节 大众逻辑平议·····	(361)
第九章 未知方向的交汇:在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学之间 ·····	(384)
第一节 大众写作与基督教的本土化·····	(384)
第二节 大众写作与本土神学·····	(423)
结语 ·····	(447)
附录一 论中国的大众文学观念 ·····	(455)
附录二 网络小说与超越性元素 ·····	(487)
附录三 主要参考文献 ·····	(492)
后记 ·····	(503)

导 言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中国学术界开始注意基督教^①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此种研究已渐成风潮。^②到今天,相关的研究专著就有十余种。^③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对 100 余年来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学关系的基本情况已能够有所了解,并能据此深入地讨论中国人精神灵魂与基督教精神深层次融会、碰撞的问题。

但如果暂不论这些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我们也容易发现,他们也普遍

① 在我国学术界,基督教有时专指新教,有时又指泛义上的所有信仰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宗教,自然包括了天主教、新教与东正教。当前学术界有时也用“基督宗教”来指称泛义的基督教概念。

为了与学术界的通常称谓保持一致(如下所列的各种研究专著均用“基督教”一词指称泛义上的所有信仰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宗教),本书的“基督教”一词,如无特殊说明,亦均指泛义上的基督教。行文中如有必要,本书偶尔也采用“基督宗教”这样的说法。

② 这方面问题从无人问津到渐被人所关注的发展过程,可参看本书“参考论文”中所列的文献。

③ 这十余种著作分别是:《十字架下的徘徊》,马佳著,学林出版社 1995 年版;《旷野的呼声》,杨剑龙著,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王列耀著,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20 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王本朝著,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戏剧的悲剧意识》,王列耀著,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许正林著,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看不见的签名》,唐小林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华龄出版社 2004 年版;《宗教情结与华人文学》,王列耀著,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 年版,此书部分涉及了佛教文化的问题,但主体仍是讨论基督教文化对海外华人创作的影响;《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刘丽霞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的叙事新质》,陈伟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等。

存在着某些局限。这些局限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研究者的注意力似乎主要集中在文学方面。在这种视角里,研究者往往只是着重勾勒文学创作简单接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一面,却很少讨论文学创作者如何回应基督教文化冲击的一面。这样的研究,不但没有触及文学创作在宗教思想建设方面作用的问题,事实上也很难深入讨论基督教文化对中国文学创作真正的价值意义。其二,研究者们的考察范围一般只停留在所谓“雅文学”的范围。各种纷繁复杂的大众文艺现象很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如偶有所触及,研究者通常试图将所论及的作品“雅化”而忽视了大众文艺创作自身的逻辑。

在这里,我们重点来谈一谈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学创作的关系问题。

关于大众文学的问题,关于大众文化与雅文化的关系问题,聚讼纷纭,本来就没有什么定论。但具体到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的大众文学,有一些问题却是能够明确的。如果按当前较流行的文化研究学派的概念,将大众文化视作近现代以来文化工业的产物,将大众传媒视作大众文化的天然载体,并认为商业化的生产属性与消费属性是大众文化的基本属性,^①那么,大众文化与所谓的精英文化的区别是明显存在的。所谓大众文学与雅文学自然也存在着从内容到形式的多方面的差别。

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阶段内,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大众文学创作中与基督教文化有关的文本因数量过于稀少,我们对有关问题固然可以不予置评。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督教文化已成为各不同价值立场大众作家的关注热点之一,与基督教文化相关的文本数量何以数十万计!且不论这些作品内容的精粗,也不论它们艺术手法的高低,单以数量论,这就是一个无法让人忽视的庞大存在。研究者们不应该无视这样一个已现实存在

① 有关的讨论,详可参看金元浦著《重新审视大众文化》(《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定义大众文化》(《中华读书报》2001年7月26日)等文。

我们在此运用这一种大众文化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学发生关系的历史性过程恰好与此种观念所界定的所谓“大众文化”在中国发生与发展的进程有着一定的耦合性。或者说,文化研究学派的大众文化观念正好能够比较恰当地解释当前中国大众文学创作与基督教文化关系的一些重要特点。但必须指出,这只是一个特例。在一般情况下,宗教文化与大众文学创作的关系是更为复杂的,宗教、大众文化、雅文化之间有着更为深刻的历史性的互动关系。大众文化的特性并不能用“消费、商业”等概念简单概括。笔者也不认为大众文化只能产生于近代大众传播媒介出现之后。详细的讨论,可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一节与附录一。

的文化现象。

当然，我们在此强调大众文学的重要性，绝不仅仅是因为海量的大众文本。大众文学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本身就具有某些不可被雅文化取代的价值元素。人们在讨论雅俗对立、大众与精英区别的时候，常常把大众与大众的创作当成一个较“低”的层次。他们倾向于认为，大众创作中较有价值的部分，通常是得之于精英文化的熏陶或教诲；大众那些与精英文化格格不入的成分，是一种阶段性的历史产物，终有一天会被淘汰或整合。如果说大众创作有何意义，其价值作用多体现在它们能够为精英文化（文学）提供一些新鲜的原材料，刺激精英群体的创造力等方面——这些原材料如果不经精英的提炼与再诠释，事实上并没有太大的价值意义。这种判断，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可商榷之处也很多。

首先，把大众文化看做低端，认为其核心观念主要来自于精英文化的影响的看法，如果说在科学认识领域没有大错，但在人文精神的领域，尤其是与宗教信仰、价值判断相关的方面，它就很有修正的必要。余英时谈道：

民间思想有时被认为是“第一层次的思想在经过一两代的‘文化滞后’以后‘渗透下来’的东西，在这样的新环境中，观念几乎总是以通俗或扭曲的形态出现”。^①作为一种工作假设，我知道这样的方法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对民间思想作如此界定，似乎仍是不够的……民间思想与正式思想的交流，特别是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交流，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单向的。当思想史的研究者发现一些来自伟大头脑的伟大思想起源甚卑，有时便可能会感到尴尬。如果允许我们将任何相对稳定的社会或文化视为一个整体，我们将会发现要在正式思想及与其相对应的民间思想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是困难的。……那些二流作家作品……据信甚至往往更加清楚地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倾向。^②

① H. Stuart Hughes, *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 New York, 1958, p. 9. ——此为原注。引者注。

② 余英时：《东汉生死观》，侯旭东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不是等价的概念，不过两者间交集处甚多。余英时教授此处的见解也适用于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略等同于引文中的“正式思想”）的关系问题。如果联系到大众文化与基督教思想的关系，精英文化就更缺乏这种天然的优位性。基督的拯救并不是专门赐给那些被称为精英的人士。基督教史上的诸多重大运动直接就是发端于民间大众而没有什么所谓精英分子的倡导（运动兴起后，许多社会精英加入其间进一步推动了该运动的发展，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宗教改革后，社会精英对于基督宗教的领导权明显增强，但诸如贵格派、卫斯理宗、浸信会、救世军、福音派、基要派等的崛起，都很难说是由精英力量直接领导的。而这些派别影响现代社会与现代思想程度之深，是完全没有必要在此加以赘述的了（这些事实颇可印证“一些来自伟大头脑的伟大思想起源甚卑”的说法）。我们当然不敢奢望能够从当前大众文学的创作中挖掘出某种中国式基督教派别创立的思想契机，但从学术研究的逻辑来说，漠视大众创作中可能的思想线索是不恰当的。^①

其次，从基督教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可以推想：在中国社会里，单凭精英知识分子群体来推动，也许并不足以形成基督教文化与本土文化大面积碰撞、融会的情况。

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在历次文化碰撞、交融中，基督教对中国上层统治阶级、知识分子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像唐高宗册封基督教聂思脱利派（在中国称为“景教”）教士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在元代，基督教不少教派（如景教、方济各会等）与蒙古高层有较密切关系等，^② 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尤其在晚明，利玛窦等人的传教在中国士大夫群体中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

^① 古代，在文化产生与传播过程中，民间大众文化恐怕不仅只是为某些个别伟大的大脑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资源而已，事实上，它还是文化传播一个主要的环节，在研究外来文化的传播过程时尤其要注意这一点。研究者指出：“中古时代的文化传播，既是渐进的，又是曲折的。由于当时物质技术条件的限制，来自‘文化本原’的直接传播不可能起主导作用，‘辗转间接’才是普遍存在的方式。因此，为了探索一种文化因缘在空间上的展开，也即为何从此地传入彼地，必须找出中间环节，才不至于架空立说。”（蔡鸿生：《仰望陈寅恪》，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7页）这一段议论谈论的虽是中古文化的传播问题，但对今天也不失现实意义。即使在近现代，“文化本原”直接起主导作用的情况似乎也不是常态。

^② 可参看沙百里著《中国基督徒史》，耿昇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一编第四章、第五章。

徵、孙元化、瞿式耜等相继受洗成为了基督徒，据信，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和思想家李贽、焦竑等也对基督教学说抱有深切的好感。^① 尽管如此，康熙末年末对传教的禁令一下，传教士的影响就被限定至一个很小的范围了。^②

虽然，从思想史上看，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在这一时期的历史性的交汇是一个辉煌的事件，但从文化成果说，如果不算利玛窦、汤若望、郎世宁等人对于中国科学、绘画艺术的贡献，我们今天并不容易见到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交汇时还留下了什么痕迹。——而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这些由传教士辛勤工作方才传入中国的“贡献”，本质上却和基督教的宗教精神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必然的联系。^③ 这不能不说是彼时基督教会传

① 可参看利玛窦、金尼阁著《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52 页。关于利玛窦在晚明士大夫中发展信徒的努力，详可参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四卷、第五卷有关章节。

据考证，明末对基督教表现出明显好感的显宦与士林领袖还有沈一贯、叶向高、吴道南、韩广、郑以伟、刘宇亮等人（上举数人在晚明政府均曾担任过六部尚书、殿阁大学士等要职。参见李天纲著《论明末以来中国基督教的文化传统》，罗秉祥等主编：《基督教思想与 21 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② 虽然此后基督教世界与清统治者高层仍保留了一定的交流往来，如耶稣会士长期把持乾隆年间钦天监监正的职位、郎世宁成为乾隆宠信的御用画家等。但这种交流是极有限的（主要集中在科技、艺术的领域），且基本处在清统治者的掌控之中。

③ 可参看顾卫民著《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年版。该书关于中国古代与基督教文化交流的资料收集相当详备。笔者查索了该书所录 1840 年前的编年资料，只有一条值得注意，乾隆三十八年修撰《四库全书》时：“其中收录天主教士所著科学书为《乾坤体义》、《圜容较义》、《天问略》、《新法算书》、《表度说》、《简平仪说》、《天步真原》、《几何原本》、《泰西水法》、《奇器图说》、《坤輿图说》、《职方外纪》等，有关宗教的书则仅存目，列子部杂家类杂学之属，计有《天主实义》、《畸人十篇》、《二十五言》、《辨学遗牍》、《交友论》、《七克》、《西学凡》（附《大唐景寺碑》）、《灵言蠡勺》、《寰有诠》、《空际格致》。”（参见《中国天主教编年史》，第 321 页）《四库全书》的书目处理方式实可视为中国古代与基督教最终文化交流成果的一个象征。徐宗泽在《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力陈传教士“所讲之学、所立之说，有起衰振敝之功、起生扶死之效”，然其所枚举的传教士于我国整个文化的巨大贡献者，仍无非是“地輿学”、“天文学”、“炮统”等（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5 页）。

又，徐氏曾引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说法：“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龙华民、邓玉函、阳玛诺、罗雅谷、艾儒略、汤若望等，自万历末年至天启崇祯年间，先后入中国，中国学者如徐文定、李凉庵，都和他们来往，对于各种学问有精深的研究……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興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利、徐诸人的影响不小。”（梁启超：《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朱维铮校注，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99—100 页。徐氏引文见《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 3 页）徐氏欲以此证明基督教文化影响之大。但详观梁任公的论

教事业的一大失败。

相比其他的外来宗教,基督教对中国的传教事业,无论从组织上、人力资源的配备上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支持上,都无疑是个中翘楚。但从实际的文化影响力来说,在1840年以前,它非但不能与佛教、伊斯兰教相比,甚至也不能说就一定超过了与印度教、摩尼教、祆教等。像祆教,研究者就指出:“《宋会要辑稿》记载宋代为求雨而祭祆。……宋代以后,在开封、河间、镇江、介休、洪洞、泽州、潞州乃至明代的广西梧州都有祆祠。祆教祭神歌称《穆护歌》,不仅见于北曲,也流行于巴蜀。”^①而从现有的文献与口传作品中,我们却很难找到基督教文化跨越宗教壁垒,影响中国人精神生活与日常秩序的痕迹。^②

述,他分寸把握是很严格的,他所说的利、徐之学的影响,就是限定在历算之学的范围内。至于基督教文化整体的影响力,他在另一处倒有一个总体的判断:“基督教本与吾国民性不近,故其影响甚微。其最初传来者,则旧教之‘耶稣会’一派也。明士大夫徐光启辈,一时信奉,入清转衰,重以教案屡起,益滋人厌。……各派教会在国内事业颇多,尤注意教育,然皆竺旧,乏精神。对于数次新思想之运动,毫未参加,而间接反有阻力焉。基督教之在清代,可谓无咎无誉,今后不改此度,则亦归于淘汰而已。”(《梁启超论清术史二种》,第82页)

① 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32页。

源于印度的佛教对中国文化影响之深自不待言,然则于印度文明体系更有决定性作用的印度教文化与中国究竟有何关系,现已颇难确考。不过,两者间当存有一定的关系。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像《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很有可能就受到了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猴子那罗、哈奴曼故事的影响。有关印度教文化与中国关系的讨论可参见季羡林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金克木著《梵佛探》(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饶宗颐著《饶宗颐东方学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著作。

《饶宗颐东方学论集》还涉及了古巴比伦文化、祆教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祆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另可参考姜伯勤著《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林悟殊著《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公司1995年版)等著作。摩尼教与中国文化之关系,可参见柳存仁著《和风堂文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林悟殊著《摩尼教及其东渐》(中华书局1987年版)等著作。

② 摩尼教、祆教、景教被合称为中古三夷教。按照权威研究者林悟殊的说法,这三种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都不大,“其与当前社会生活,无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殆无任何直接的联系”(林悟殊著:《中古三夷教》,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页)。但比较而言,摩尼教、祆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尚能找到某些痕迹,但景教的影响,则几无留痕。有关的情况,可参见穆尔著《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郝镇华译,中华书局1984年版)、朱谦之著《中国景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林悟殊著《中古三夷教》、林悟殊著《唐代景教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另,柳存仁在《唐代以前拜火教摩尼教在中国之遗痕》中谈到,现存道经(主要是《度人经》)中,可能因受摩尼教的影响而存录了“若干与基督教《圣经》有关之材料”[《和风堂文集(上)》,第497页],亦可参看。至于基督教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关系,各种论及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的研究著作多有论述,在此不一一详举。

据此我们也就有理由推想：在中国社会里，单凭精英知识分子群体来推动，是否并不足以形成基督教文化与本土文化大面积碰撞、融会的情况？基督教传入中国，即使在上层统治阶级、知识分子群体中吸引了一些信徒，但这些信徒入教后便往往与原来的文化环境相脱离了，不能为基督教带来很多的文化资源。他们的思想创造、对文化建设方面的意见，除了在固有的小群体中能够产生影响，对社会大众并没有什么影响力。（这和他们处于传统士林中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社会大众有自己的文化逻辑。他们也许不能清晰地认识到基督教价值与传统观念的分裂，但深厚的文化底蕴，审慎的生活态度使他们不会为一小部分人激进的声音轻易撼动。（这和传教士在世界其他地方碰到的一般社会民众有根本的差别。）也许正由于这种情况，晚明时期，当敏感的知识分子群体正为是否应当（或可以）接纳基督教文化价值体系的问题而形成争论甚至争吵的时候，社会大众对之却没有什么反应。当然，限于资料，我们事实上已不可能对古代中国的基督教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问题作真正深入的研究了。

我们的研究应当认识到精英文化的这种局限性。虽然在今天，各种社会文化状况与中国古代已有很大的不同，但精英与大众分立的情况依然存在。事实上，这种分立的情况随着大众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地位的提高还变得更为明显了。^① 在这种分立中，精英所感兴趣的问题，远不是大众所感兴趣的问题；精英群体所普遍尊奉的价值，未必是大众所尊奉的价值；即使表面上都对同一事物作出了反应，但两者的立场角度却根本不同……对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间诸如此类的差异，研究者需要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也就是说，在研究基督教与当代中国的关系过程中，即使是针对同一个问题，我们在考察精英文化（在中国，研究者还得兼及一般主流文化的考察）之余，很有必要研究大众文化对此问题的反应态度；另外，在对一般作为重点研究对象的精英文化作系统研究的同时，我们还有必要研究大众文化所产生的某些特殊问题。

不仅限于此，从大众文学作品来考察基督教文化还涉及了一些重大的思想问题。比如，如果说，当前的大众文化已日益商品化、消费化，这种形式的大众文化会不会影响到基督教文化的存在形态？或者说，基督教文

^① 大众与精英当然也有融合的一面，某些情境里，大众群体颇唯精英意见是从。我们暂不讨论这类现象。

化当做怎样的调整来应对此种社会文化的根本性的变化？从大众文本中我们能否找到与此相关的思想线索？

再比如，我们如何来看待大众文化的终极价值意义呢？能否如巴赫金探讨中世纪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的对立那样，设想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也是对立的两极，强调大众文化的不可被精英文化规约的性质，强调它对现时代人们的乌托邦式的或反乌托邦式的意义？在这种价值的讨论中，基督教文化正成为一块绝佳的试金石，以此，我们可以检验大众文化对终极问题构造的基本形态与内涵。

第二节 研究的范围与对象

有关大众文化问题的研究，当然不能离开大众文学的具体文本。本书的研究范围，将确定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本书将以当前的网络文学作品作为主要的文本分析对象。

网络文学已成为当前大众文学最主要的存在形式。这已是一个无可讳的事实。

自 20 世纪末诞生以来，网络已催生了大量的原创文学文本。以当前中国最大的原创文学网站“起点中文网”为例，到 2009 年 4 月初，它推出与介绍的网络原创作品已多达 30 万余种。如果将起点、17K、幻剑书盟、榕树下、西陆文学、四月天、科幻世界、书路、中华小说、天涯文学、上砚侠客网、翠微居、逐浪、晋江、露西弗等几十个国内知名原创文学网和各种同人（即出于相似爱好而形成的群体）网站中流传的文本总合起来，最保守地估计，现今在各网站流通的原创作品不会少于 60 万种。而从读者的接受来看，网络原创文学的阅读群体已相当庞大。仍以“起点中文网”为例，其各种排名榜上排名在前的小说，点击阅读的次数大多已超过了数千万次。大部分排名在前 400 名的作品点击亦在数百万次以上。如果将各文学网站的固定读者总合起来，这会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而在这些作品中，又有相当数量和基督教文化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详论可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一节与附录二）。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对网络文学中有关的文化现象作专门的分析都是很有必要的。

第二，就中国当前大众文化发展的现实来说，以网络文学为基点考察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大众文艺的关系，几乎是一种必然，也是一

种无奈。

人们当然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基督教文化因素已在相当程度上融入了中国当前的大众社会：圣诞节、万圣节等具有基督教文化内涵的节日渐渐为一般民众接受；许多大众文艺作品已自然化用某些基督教观念，如“救赎”、“忏悔”、“末日审判”，等等；许多大众社会的日用之物，已自然融入了某些基督教元素，像许多建筑、民居的造型、装饰都明显具有此种痕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不过，对这一类现象细加透视，我们立刻会发现，如要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实难解决。其一，这一类现象与基督教文化精神有无直接关系，很难作出直接的论断。就笔者个人的意见，从根柢上说，它们与其说是接受了基督教文化的内涵，还不如说是全球化的产物。其二，如将这类现象纳入到文化研究的视野中，我们会发现这一类对象文本过于零散，资料收集非常困难；内容一般又比较浮泛，也很难做系统的整理研究。^①

① 这里且以郭德纲的一段相声为例。郭德纲在一段相声里这样编排上帝：

郭德纲：帝哥，我希望天下和平，天下百姓们安居乐业，国泰民安，没有战争，行吗，嗯？

上帝想了想，这难点儿，咱实话实说啊，我没那么大造性，真的真的，我也不跟你说别的，你换一样行吗？咱商量商量别的。我一摸身上带了一张李菁的相片，帝哥，你看看这个，这是我师兄弟——李菁，长得挺寒碜的，搞不上对象，你给他变漂亮点儿吧。

上帝：（想了想）还是说说世界和平那事儿吧（把相片撕了）。

郭德纲：哎，你怎么把相片撕了，啊？你不同意归不同意，撕了干吗，我还留着避邪呢。

（郭德纲：《非著名相声演员》，凤凰出版集团江苏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页）

如果单就这一文本进行深入的意识形态分析，人们似乎可以从其中发现基督教文化的一些思想元素。首先，相声中的说话人郭德纲要找天上的至高者，找的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其他的各位诸神，而是“上帝”，某种程度这是对上帝至尊地位的默认。其次，相声中向上帝提各种要求，这包含着对上帝全能的默认。再次，相声中向上帝提的主要的愿望是“希望天下和平，天下百姓们安居乐业，国泰民安，没有战争”，这其实也包含着对上帝至善的认同。也就是说，即使是这样一个俗文学的小段子，也不能说与基督教文化全然无关。但如果综合更多线索考察，我们却发现连上述这类具有相当保留成分的判断也难以给出。因为这可能是民间文化所发出的颠覆性的声音。就是说，这类文化活动对基督教文化的评论（是纯粹亵渎性的还是带有某种肯定成分的亵渎），只根据其狂欢精神所流溢的场景发出，但其评论本身并不涉及价值判断。对比郭德纲相声《我要旅游》（可参见郭德纲、于雪著《郭德纲这点事儿》，海天出版社2009年版，第218页），人们对此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问题的复杂性于此可以看得清楚：除了网络文学，一般的大众文化虽可能与基督教文化有所交集，但其内容大多是零散的、片断性的、浅尝辄止的。研究者简直没有办法搜罗到足够丰富且全面的文本对问题展开深入的分析研究。本书对这一类现象暂且略过不论。

因此，如要系统地研究基督教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影响关系，且要对相关问题作出深度的透视，从目前实际情况说，以网络文学作为主要分析对象，是较为适宜的选择。

我们将以此作为个案，进而尝试讨论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大众社会、大众文化在当前的关系实质。

第三，本书主要研究大众文学中基督教文化内涵，但我们也将把目光扩展至大众文学对一般超越问题及中国式超越问题的表现上。

超越问题当然并非全都与基督教文化相关，中国更有着自己的文化传统。但从创作实际上说，当前大众对超越问题的热衷却与近 20 余年来中国当代社会中基督教影响陡然增强的文化事实有直接联系，甚至可以说有一种因果联系。因此，讨论基督教文化对中国创作的影响，有必要将视界推向更开阔处。这是本书第五章、第六章的主要内容。

至少就中国大众文学目前的创作情况来说，做这种衍生性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比较符合大众文学界对超越问题思考的实际水平。

第四，网络文学创作中的各文学母题不是凭空出现的。我们书中的讨论，偶然会涉及相关的传统形式的大众文学写作的情况，也会涉及一些其他类型的当前流行的大众新媒体艺术。

第五，从泛义的角度说，教徒们所创作的大量作品，也可归入大众写作的范畴。但教徒的写作一来传播范围极受局限（大体在成员固定的信徒群体中流传），与外部社会文化整体互动有限；二来取样十分困难（其创作多以手稿、自费印刷等形式出现，且多在固定地域和群体中流传），因此，作者目前还没有能力对其作整体性的研究。

当然，本书也将尝试着对其一些有代表性的具体个案作专门的讨论。

第六，我们的研究，以中国大陆地区的大众文学创作为主，兼及一些对大陆大众文学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港台作家如金庸、黄易、司马翎、倪匡等人的创作。

第三节 研究的方法

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是异常复杂的。作家的创作在怎样的层面上受到了宗教文化的影响，有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很难作出明确的判断。有些创作者表面上鼓吹某种宗教信仰，但实际的描写却与此种宗教没什么太